

信仰和理想的聖愛與俗愛

張淑英（台大外文系教授）

一九九八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葡萄牙作家薩拉馬戈（Jose Saramago, 1922-2010），二〇一〇年六月十八日在西班牙蘭沙洛德島（Lanzarote，屬加納利群島）辭世。八十七高齡歸去的他不會在意年齡數字，他在〈明日是唯一的烏托邦〉詩中這樣寫著：「問我幾歲？誰在意呢？我說幾歲就幾歲，我感覺多大就多大，讓我可以無懼地怒吼，說出我想說的話。」字裡行間洋溢著狂狷的氣息；然而，病榻前的薩拉馬戈，時而悲觀虛無：「我們對待生命，像是法官又像劊子手，價值觀喪失殆盡，我們愧對生命。」薩拉馬戈與世長辭，文壇諸多不捨，唯一尚有微詞者是梵蒂岡，針對薩拉馬戈對教義批逆鱗、挑動宗教的禁忌、《聖經》的負面批判予以駁斥。梵蒂岡的敏感呼應了薩拉馬戈的無神論以及創作的軌跡。一九八二年薩拉馬戈向國際文壇扣關，矢志文學創作的里程碑的《修道院紀事》（*Memorial do Convento*），便是開啓宗教議題的首部代表作，接續的《耶穌基督的福音》（*O Evangelho Segundo Jesus Cristo*, 1991）和最後一部小說《該隱》（*Cain*, 2009），也是環繞宗教、聖經人物為主軸，闡述他對信仰的質疑，並否認教會的功能。如今，近三十年後，回首展讀《修道院紀事》，薩拉馬戈行文不溫不火，不疾不徐，底蘊卻瀰漫字字針砭的嘲諷，將後續的著作主題彷彿早已收納其中，彼時蔚為風尚的創作技巧也在這部試金石中渾然天成。

《修道院紀事》在兩條路徑上耙梳鋪陳，原來應該是相輔相成，彼此調和，卻因時空、環境因素的扞格，變成二元對峙，成就了其一，就得犧牲其二那般殘缺。《修道院紀事》在歷史真實與虛構故事間交錯延展，這平行編織麻花的寫作技巧儼然是文人創作的基本功、必備的寶典。故事發生在十八世紀的葡萄牙，葡王若望五世（João V de Portugal）因王后瑪麗亞·安娜夫人（Maria Ana de Áustria）婚後近三年不孕，擔心王位後繼無人而憂心忡忡。彼時掌管宗教裁判所的神父努諾·庫尼亞神父引領安東尼歐修士，向國王進言，國王若承諾在瑪弗拉市（Matra）建造一座專屬方濟會的修道院，神蹟自然出現，國王必有子嗣。國王許下承諾，果然不久後王后傳弄瓦之喜，芭芭拉公主（Maria Bárbara de Bragança）誕生，長達十二年（1717-1730）的修道院建造工程於焉展開。

高高在上的皇朝帝力那一方大興土木展開修道院工程當兒，凡夫俗子的民間這廂深情款款的愛戀故事正漸次加溫。布莉穆妲（或名為七個月亮），一個出身卑微、有超能力能透視萬物、洞悉人心的奇女子，和巴達薩·馬堤烏斯（或名為七個太陽），在戰場上犧牲左臂而退役的軍人，兩人相遇，陰陽調和，滋生愛苗。布莉穆妲和巴達薩結識了人稱之為「鳥人」的羅倫索神父。羅倫索神父醉心飛翔，潛心致力發明飛行器「帕莎羅拉」，期待國王親臨見證，深信利用各種金屬、物質的組合和念力，能一飛衝天。相較修道院的奢華與豐沛資源，「帕莎羅拉」的理想是捉襟見肘，空中樓閣。當修道院的土木工程被視為是「聖愛」的展現，布莉穆妲和巴達薩的「俗愛」就得被火刑隔離。

十八世紀的歐洲，巴洛克的繁華近尾聲、新古典的啓蒙時代蓄勢待發。瑪弗拉修道院正是這兩個思潮衝撞的火花，有著洛可可的華麗元素，也有典型葡語文化所稱的麻花雕飾（紊亂的珍珠）：外表色彩

光亮柔和，線條高雅簡潔，內部豐富多彩亮麗。在那個開始標榜藝術科學化，建築理性化，需能改進人類的生活的宗旨下（諸如醫院、圖書館、劇院、公園、美術館），教堂誠然已屬過剩的建築。歷史上若望五世和瑪麗亞·安娜王后共有七子女，三位還榮登王位寶座。葡萄牙的瑪弗拉修道院真實存在，因為芭芭拉公主的誕生而興建，且因葡萄牙海外殖民，從巴西帶回大量的金銀而從單純的修道院擴建成金碧輝煌的皇宮。

另一方面，同時期另一位歷史人物，卻鮮為人知。彼時來自巴西的耶穌會神父巴赫托羅繆爾·羅倫索·古斯茂（Bartolomeu Lourenço de Gusmão, 1685-1724）上書若望五世，說明他正進行高空熱氣球的研發，速度比海陸都快，且能克敵致勝，希望得到王室的保護與支持。據稱，一七〇九年羅倫索神父當著國王、諸多諸侯和外賓面前展示，熱氣球離地四公尺，眾人稱奇。「鳥人」之名不脛而走，而該浮空器便稱為「帕莎羅拉」。然而，當時的里斯本樞機主教，也就是後來的教宗諾森十三世（Inocencio XIII, 1721-1724）擔任教宗；原字義有「天真、幼稚、無辜」之意），斥之為粗陋危險器物，詆羅倫索為魔鬼信徒，致使羅倫索踉蹌走避西班牙，重病亡故，得年三十九。羅倫索這位歷史人物的生平軼事，因薩拉馬戈寫入小說儼然成為正史，然而敘述事件如展示熱氣球、宗教迫害等情事迄今爭議依然。

古今中外，歷史或傳說，因為集權專制、因為君無戲言、因為君（軍）令如山、因為耽溺迷信、因為宗教虔誠、因為深情摯愛、因為好大喜功各種因素——希律王斬斷施洗者約翰的頭顱，當作莎樂美的犒賞；沙迦罕為了紀念已故皇后姬蔓·芭奴，用了二十二年的時間建造了泰姬瑪哈陵；秦始皇為個人人生／死兩大事興建阿房宮和驪山墓，耗時三十餘年且工匠均遭活埋。各種宗教因為神蹟顯靈、許願還願而產當兒，雕樑畫棟下隱含無數人性的厚黑學。

薩拉馬戈顯然在這部小說回應並傳遞了啟蒙世紀思想之父伏爾泰對君主專制體制和天主教與基督教的批判。伏爾泰認為歷史的研究不應以「君主」為中心，應該以運動、流派過程及人民為中心。他的自然神論甚至認為教宗是「兩足禽獸」，傳教士是「文明惡棍」，宗教是「狡猾人士編織的一個最可恥的欺騙伎倆」，正如他的《無知的哲學家》（*Le Philosophe Ignorant*, 1766）中所指的第四種無知：「可笑無知」，亦即教會對神蹟和奇物的荒謬崇拜就是一種無知的表現。薩拉馬戈針對無知的諷刺，在後來出版的小說《盲目》（*Ensaio Sobre a Cegueira*, 1995）中更是醜態灌頂，點出人類「眼清目明」的盲目和視而不思的愚癡。

《修道院紀事》英譯本以《巴達薩和布莉穆妲》（*Baltasar and Blimunda*）在書市傳銷，顯然牽引讀者移往男女情愛的故事去想像。的確，《修道院紀事》除了興建教堂和發明熱氣球的史實外，另一條吸引讀者展讀扉頁的橋段便是斷臂的巴達薩和具有特異功能的布莉穆妲。薩拉馬戈筆下的愛情，在男歡女愛

的情慾描寫上是大膽、直接、激情，但是在情感表達上卻是無言無聲，沉默深遂，不用愛的字眼來細訴愛的故事，令人爲之揪結心疼到無法哀號。薩拉馬戈作品下的女人泰半是鄉間婦女，出身中下階層，在環境中逆來順受，性格純樸內斂，但堅忍剛毅。《修道院紀事》裡的布莉穆姐，不是傳統角色中「讓人觀看／被凝視」的女人，而是一個「看得見」的女人，且男人的發明需要她的觀看念力扶持。與其說女性的眼神在這部小說中取得主動、發揮權力的角色，不如說薩拉馬戈謳歌女性外柔內剛的天性和力量，造就了男性所有的可能。布莉穆姐跟著巴達薩協助羅倫索神父研發飛行器，她既能洞悉人心，故一切了然於心，更無需言說。那一夜，巴達薩留在山區修理「帕莎羅拉」，兩人一聲告別，從此卻不知去向。那一別，就是九年。布莉穆姐尋夫九年，耐心未耗盡，信心卻磨蝕。在那無怨無悔的眼神中，在一堆受火刑的人群裡，她從篝火辨識出那位沒有左手的男子，呼喚一聲他的意志：「來吧！」巴達薩那團意志的魂魄投向布莉穆姐的懷抱。

巴達薩和布莉穆姐在《修道院紀事》是虛構的故事，布莉穆姐淡淡地釋出她深沉的哀愁，她的溫柔與慈悲是她的俗愛神聖之處。「屬於塵世的，不該歸天」，《修道院紀事》的結局也是薩拉馬戈生命謝幕的結局，他留下珍貴的葡文創作在里斯本的「薩拉馬戈紀念館」，永存人間。